

第一輯 ● ●

方國瑜文集

云南教育出版社

(滇)新登字 03 号

责任编辑: 李鸿启 王晓卫

封面设计: 袁亚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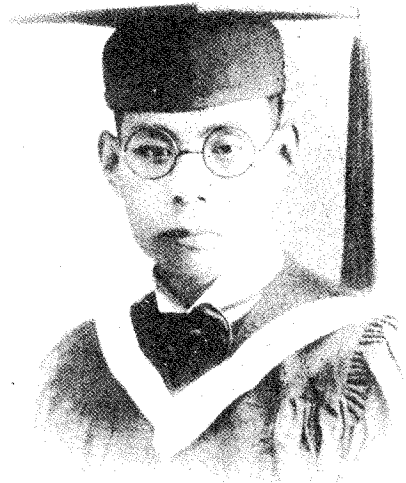
方国瑜文集

第一辑

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	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	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×1168	1/32	印张: 24.25	字数: 480000
1994 年 8 月第 1 版		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	
印数: 1—1500 (精装 200)			

ISBN 7-5415-0810-1 / G · 659 定价: (平装)17.90 元
(精装)20.90 元



青年时期照片

中年时期照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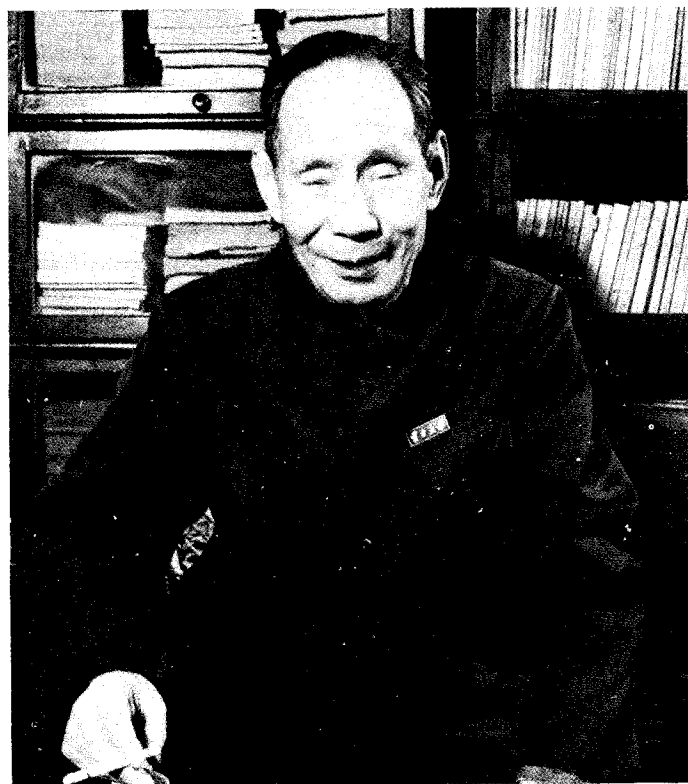


与陈垣先生合影





新婚三朝留影
(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)



晚年照片



编辑说明

方国瑜教授是名扬四海的教育家、史学家、语言学家、民族学家。他的一生主要从事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，是西南民族史的开拓者，云南地方史的奠基人。他以数十年的勤奋工作，给我们留下了丰硕的科研成果。除已出版的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、《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》两部巨著外，还有大量的史学论文，有的在学术刊物上发表，有的尚未刊布。为继承这份极为珍贵的遗产，我们编辑了这套文集。这套文集的出版，对于学习他的治学实践和经验，接受他的教益，吸取他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，推进我们的史学研究，都有重大意义。

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方国瑜教授自选的史学论文集：《滇史论丛》。《滇史论丛》已刊载的文章，不再收入本论文集。

《方国瑜文集》共三辑。第一辑是研究先秦至唐五代时期的史学论文。第二辑是研究宋元时期历史以及有关云南民族历史、民族文字、云南金石、云南古代对外交通及云南掌故等方面的论文。第三辑是研究明代至民国时期的史学论文。民族调查，还有他晚年写的几篇理论文章。希望这样的



编排，有利于读者对云南地方历史作系统的学习和研究。

文集所选辑的各篇文章，基本上按报刊上发表时的原样或方国瑜教授的手稿、誉清稿排印，只对个别的引文作了校对。原来没有句读的，加了标点符号。

由于时间仓促，水平有限，经验不足，本书的编辑定有不少缺点与讹误，恳祈专家与读者教正。

本书的编辑得到各方面的关心，尤其是得到云南教育出版社的热情支持，还得到方国瑜教授的子女方霭祺、方应祥、方福祺、徐兴祥的帮助，伍谢瑞芝基金为本书的出版予以一定资助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明年，是方国瑜教授诞生九十周年。我们编辑出版三卷本《方国瑜文集》，藉以表示对方国瑜教授的尊崇、怀恋、学习和纪念之情。

林超民

1992年10月

南中泰斗 滇史巨擘

——方国瑜先生传略

方国瑜，字瑞臣，云南省丽江县人，男，纳西族，清光绪二十九年（公元1903年）正月十八日诞生。婴儿时体弱多病，逾一岁曾气绝复苏，三岁始学步，五岁行走犹未稳。因不通汉语，九岁始发蒙读书。自谓“资质粗笨”，故勤奋补拙。读《论语》“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”之句，不甘居下，自署书屋为“困而好学斋”以自勉，促居书屋，终日伏案，所读四书五经诸子之文，至老犹能成诵。

1922年夏，先生毕业于旧制中学，乃外出远游，1923年4月到达北京。1924年，先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，以勤奋学习见重于师友，与同班好友湖南谢伯屿（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委员）被推举为校学生会干事。先生从中国共产党办的《向导》周刊上接受民主革命思想，以“读书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读书”相号召，积极投入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，后被选为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干事和全国学生总会干事，参加了纪念“五四”运动五周年在天安门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。北京市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《政治生活》就在这一天发行创刊号。先生得知这个刊物的主办人是云南同乡剑川人张伯简，而先生早在丽江读中学时，就读过张伯简从法

国寄来的宣传品，便主动与他取得联系，又通过张伯简认识了《向导》周刊的发行人李树青。在担任全国学生总会干事期间，先生与谢伯屿、吴平地（中共党员）等共同组织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学生去天安门参加示威游行，高呼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、“打倒军阀”等口号，要求赶走黎元洪、曹锟，迎接孙中山先生来京组建“临时政府”。当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时，先生被推为学生代表，进入北京火车站月台迎接孙中山先生入京。

1925年，先生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“五四”运动纪念大会。游行示威时，先生奋勇当先，与警察英勇搏斗，右臂被打伤。先生不因此畏惧退缩，斗志愈高。为揭露上海“五卅”惨案的暴行，在伤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，毅然率领一个学生小分队到天津、济南、南京、扬州进行宣传。返京后，先生即加入云南左派学生组织“新滇社”，并主办《云南》周刊，积极鼓动革命。

1930年春，在钱玄同的鼓励下，先生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，同时在两个学校研读，先后从钱玄同、余嘉锡、马衡、刘复诸先生，攻读音韵、训诂、目录、校勘、金石、名物之学，又得高步瀛、吴承仕、黎锦熙诸先生的启发诱导。与此同时，北师大历史系主任陈垣见先生所写《中国道教史》颇有见地，知先生是边疆民族学生，十分赏识器重，指导他选修大量史学课程，并从杨树达、梁启超诸学者治史地之学。这段时期，先生纵观四库典籍，广及海外译著，钩稽故实，发微阐幽，多有论著发表于报刊，为学术

界重视。先生生前清理三十岁以前存稿，认为可取而亲自编定者，有《广韵声汇》一书（共三十八卷、分装两函十二册），《困学斋杂著五种》，包括：《广韵声读表》、《隋唐声韵考》、《慎子考》、《慎子疏证》、《论学存稿》。尚有《说文声汇》、《释名声汇》、《石鼓文研究》、《论语朱注匡谬》等底稿若干册。

1932年，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本科，第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。先后任北师大研究院编辑员、洛阳师范学校教师、北平私立民国大学国文系教授。当时，刘半农任北大研究所所长，建议先生回乡整理研究纳西象形文字。1933年，先生回到故乡，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、巨甸等地考察，首次发现纳西标音哥巴文摩岩，向东巴经师学习，调查记录了大量东巴资料。1934年6月满载纳西象形文字资料回到北京，不久，刘半农先生病歿，经董作宾介绍，到南京向赵元任、李方桂两先生学习语言学，用国际音标给纳西语标音，编成我国，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科学的《纳西象形文字谱》。因此先生被西方学者尊称为“纳西历史语言之父”。

1934年秋，先生在南京寄住历史语言研究所，所内藏书十分丰富，南京图书馆又多有善本，先生得尽情纵览，约一年时间，辑录云南地方史料盈篋。先生后来成为云南史学界巨擘，其根基于此奠定。时值中英会勘滇缅边界，英、法帝国主义覬觐我云南边疆，蚕食鲸吞，凶相毕露。先生痛感清季外交丧权辱国，满怀爱国义愤，撰写文章，考证中国西

南边疆沿革，以历史事实痛斥英、法侵略者无耻谰言。由此，先生倍感史地之学在维护祖国统一，反击侵略中的重大作用，立定志向，专攻西南史地之学。1935年经李根源推荐，先生回云南参加界务交涉，九月到滇西边地考察，亲履傣族、拉祜族、佤族地区，写成《滇西边区考察记》等专著，迄今仍为学术界推崇；为民族学、边疆史地学的重要参考书。

1936年夏，经袁嘉谷先生一再邀约挽留，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，先后任文史系教授、文史系主任、文法学院院长。1938年后，又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、审定、续修之职，撰写了《建置沿革》、《疆域考》、《金石考》、《宗教考》、《族姓考》诸目，并参加了全书的编纂和审定工作。为《新纂云南通志》的编纂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先生邀约凌纯声、向达、楚图南、闻宥等学者编辑出版《西南边疆》杂志，指点江山，纵论边政，研究边疆史地，探讨民族风俗。云南大学创建西南文化研究室，先生任主任，克服资金不足、纸张缺乏、印刷不便等困难，先后出版丛书十一种，为活跃西南学术空气，提高边疆学术水平，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
1946年，保山旅省同乡会聘约几位学者纂修县志，推先生任总纂。在此之前，先生曾协助李根源先生编纂《永昌府文征》，多作题跋。先生到保山乘便收集滇西抗日战争资料，周历惠通桥、松山、龙陵、芒市、遮放、黑山门、畹町、腾冲诸战场，深入调查访问，广收油印战报、走访亲历

其事者，写成《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》六卷，为国内关于滇西抗日战争最翔实最珍贵的资料。其中一部分收入《保山县志》。先生主持的《保山县志》编成三十余册，已誉写清本交县志馆，今存县文化馆，因各种原因，此书迟迟未能付梓刊行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先生在政治和学术上都获得新生，从潜心考据的学术生活中解脱出来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以高昂饱满的政治热情，勤恳踏实的学术态度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，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和云南地方史、民族史的研究。在繁忙的教学、科研之余，先生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，1954年协助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，1956年参加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，担任云南省民族调查组副组长，参加创办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，并任副所长。先生夜以继日，查阅大量文献，编写了《云南民族记录》等重要参考资料，并亲自到楚雄、大理、西双版纳、德宏、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考察、指导工作，为云南省的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1954年，周恩来总理来昆明，视察云南大学时指示：历史系应结合地方特点，加强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。先生立即响应。同年秋季就在历史系开设了云南民族史课程，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编写了六十余万字的《云南民族史讲义》。第二年又开设云南史籍评论课程，写成《云南史料目录解题》一书作为教材，接着又开设彝族史、白族史等课程。这

些都是从无到有的创举，为云南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开拓了道路、奠定了基础。在先生的努力下，1959年秋，历史系创办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，他倡导并与其他教师合作编写了《中国少数民族史讲义》上中下三册约六十万字。1963年又创办云南民族史研究室，1979年发展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。昔日冷门寂静的学科，已渐呈繁荣景象。云南大学历史系以民族史的教学和科研显出特色，受到国内外的重视，今天国内不少有成就的西南民族史、民族学的中青年专家、学者，就是先生亲自培养的学生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先生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，遭受各种侮辱、折磨和迫害，住房被强占，书柜被查封，不少书籍文稿被掠劫而去。但先生坚信这决不是共产党的政策，抱定“别人想怎么说由他，自己应如何做在我”的宗旨，白天挨批斗，晚上在局促狭窄拥挤的房间里俯首案头，奋笔疾书，改造旧作，撰写新篇。1969年10月，先生被赶到弥勒县农村“改造”。第二年春，因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编好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，先生是该“图集”西南组的负责人，便被召回参与工作。尽管当时仍是“控制使用”、“监督改造”，但先生置之不顾，全身心地投入工作，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，于1972年底与尤中、朱惠荣等一起完成了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西南部分的编绘工作。从1973年初，着手整理《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》，到次年8月完稿，全书百万余字。因过度劳累，9月初长期胃溃疡病又一次发作，吐血过多，一时不省人事，经医生大力抢救，切除胃脏五分之三，疗养调

理四个月后方康复。躺在病床上，先生想到人至垂暮，时日已短，不能一事无成，不待病愈，便已考虑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的整理和撰写。出院后，立即动手工作。先生多年来患眼疾，到1972年已日趋严重，到广州、北京、上海求医，亦无起色，视力减退，有加无已。到1975年看书除戴深度“盲人眼镜”外，还须加上高倍放大镜。写字因数十年锻炼，“指头有眼”，虽写时已看不清，仍勉成字。先生就这样坚持俯案著述，无日或已，经两年努力，终于完成百万余字的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先生心情振奋，精神焕发。先生写到：“举国欢腾，欣欣向荣，鼓舞着我不能丝毫松懈，要克服一切困难，加倍努力。”“瑜虽目力困难，丧失独立工作能力，但意志不能稍衰。”先生领导云南地方史研究室制定了1977年至1985年的八年规划，力图将云南地方史、民族史的研究提高到新水平。1980年先生向党提出了入党申请，在自传中先生说：“今年我已是七十七岁，但在大好形势下，并无迟暮之感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前途无限光明，矢志为社会主义事业，为建设现代化强国，竭尽锦薄之力。”先生想到来日无多，更是争取时间，忘我地加紧工作，克服双目失明、年高体弱的困难，主编了近千万字的《云南史料丛刊》，同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。先生以顽强的意志，勤勤恳恳、不知疲倦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实现了为党的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的誓言。

先生的一生，是追求光明、追求进步、追求真理的一生。先生热爱祖国、拥护中国共产党、严格要求自己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先生一再向党表示：“要求入党是我二十多年的愿望，要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作为我的人生目标。”根据先生生前的申请，经云南大学党组织讨论通过，报请中共云南省委批准，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四十七年，建国后，历任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、文法学院院长、九三学社云南省工委副主委、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、全国史志编纂委员会顾问、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、亚非学会理事、中国教育学会理事、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、云南省民族调查组副组长、云南省文联副主席、云南省历史学会会长、中国史学会理事、云南民族学院顾问等职。1950年后，曾当选为昆明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，第一、二、三届云南省人民代表，第五、六届云南省人大常委会，第三、四、五届全国人民代表。

先生是云南地方史的拓荒者，在云南史学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著名史学家称先生是“南中泰斗”、“滇史巨擘”。

先生在云南史学研究中最杰出的贡献，是对云南地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，他主持编纂近千万字的《云南史料丛刊》，花费四十余年心血，数易其稿，写成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一书，全书三册，百余万字，著录云南史料八百余目，对于云南史料的著录、评说，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，为

云南历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，是八十年代我国史学著作中难得的硕果，1990年荣获云南省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。

先生的另一独特贡献是开拓了对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，撰写了百余万言的《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》。本书对云南历代的疆域沿革作了深入细致的论证，对县以上地名也进行了认真考释，确定了方位，填补了云南历史地理研究的空白。荣膺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。

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四十七年，教学态度一贯严肃认真，尤其重视基础课的教学。培养研究生，先生总是从打基础入手，让学生在版本目录、校勘训诂、史学史、史料学等基础上下功夫。先生谦虚谨慎，平易近人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奖掖后生，扶持青年，诲人不倦，为后学师表。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尤寄以殷切期望，对读书门径、治学方法，无不耐心指点、纤悉以告，每次接谈，辄三数小时，娓娓不倦，凡向先生进业求教的人，无不为之感动。

先生在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·后记》中说：“各人的能力有大小，只要活着，应当尽力而为，不然生命没有意义了。”先生认认真真地治学，勤勤恳恳地工作，清清白白地作人，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。先生的一生，都献给了云南史地的研究，献给了民族史的研究。先生大量的学术著作，展示着他超群的才能与深厚的功力，浸透着他一生的心血，闪耀着生命之光。

(林超民)